

## 利比亚战后乱局中的部落因素

王金岩

**摘 要:** 利比亚战后未能实现政治和经济重建,相反却陷入了严重动荡,恐怖极端势力趁乱进入并大幅扩张。利比亚战后乱局形成的原因众多,其中部落因素成为造成当前政局动荡的主因之一。具体而言,部落因素对政权过渡、经济重建、安全环境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产生了多重影响。此外,在利比亚未来的政治和解及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部落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关键词:** 利比亚; 政治重建; 安全危机; 部落制度; 部落文化

**作者简介:** 王金岩,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7)。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6)04-0104-14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利比亚战争推翻了持续四十余年的卡扎菲政权。然而,利比亚战后重建至今仍危机重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政局持续动荡,政府权威缺失;经济重建停滞,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安全局势恶化,部落冲突频仍,极端恐怖势力肆虐。部落作为利比亚自古至今的基本社会单元,始终伴随国家历史进程的发展,对国家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在利比亚战后乱局中,部落无疑是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

### 一、利比亚发展历程中的部落因素

部落是利比亚历史上早期出现的社会组织。在漫长的国家发展过程中,部落制度曾被外族侵略者和殖民者用作征服和统治的工具,也被独立后的统治者作为维持权威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历史变迁中,利比亚民众的部落认同和部落意识根深蒂

固,部落政治是利比亚政治的典型特征之一。

### (一) 利比亚部落与国家关系研究综述

部落是利比亚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权威的社会交往单位和社会结构单元,利比亚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部落认同进行划分的。部落认同是一种“建立在血缘或亲缘联系基础上的非正式认同”<sup>①</sup>,部落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与国家发展存在着多层面的互动关系。但是,利比亚前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其任内的四十余年间,一直禁止国内关于本国部落问题的研究,直到2011年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利比亚国内才零星出现利本土学者关于部落问题的著述。此外,二战后利比亚独立以来,大部分时期较为封闭,外界也难以进入利比亚对部落问题进行实地深入研究。利比亚战争爆发前,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位西方学者运用政治学<sup>②</sup>、社会学<sup>③</sup>、历史学<sup>④</sup>、人类学<sup>⑤</sup>、经济学<sup>⑥</sup>等学科理论考察部落在现代国家发展进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政治学家、开罗美国大学前校长丽莎·安德森(Lisa Anderson)在《突尼斯和利比亚的国家与社会转型 1830~1980》一书中研究了包括部落因素在内的影响现代利比亚国家建构的各种因素,从历史视角分析了部落认同在利比亚持续存在的原因及其在各阶段的发展。<sup>⑦</sup>21世纪初,美国学者德克·万德威尔(Dirk Vandewalle)在《现代利比亚史》一书中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分析了利比亚的国家建构问题。<sup>⑧</sup>作者对利比亚部落与国家的关系进行考察,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卡扎菲的革命。作者指出,在一般意义上,部落与国家的原生关系趋于弱化,但部落认同的增强和其他传统权威的存在均对现代化进程构成了挑战。作者同时认为,各种社会变迁都可概括为从传统向现代,从简单到复杂,从特殊到一般的转型

① Haala Hweio, “Tribes in Libya: From Social Organization to Political Power”, *African Conflict and Peacebuilding Review*, Vol. 2, No. 1, 2012, pp. 111-121.

② David and John, *Libyan Politics, Tribe and Revolution: An Account of the Zuwaya and Their Government*, Californi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③ Faleh Abdul-Jabar and Hosham Dawod, eds., *Tribes and Power: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Saqi, 2003.

④ Jamil M. Abun-Nasr, *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⑤ Katherine E. Hoffman and Susan Gilson Miller, *Berbers and Others: Beyond Tribe and Nation in the Maghrib*,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⑥ Innleik and Halil,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⑦ Lisa Anderson, *The Stat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unisia and Libya, 1830-198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⑧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过程,但利比亚的情况正好相反。2011 年利比亚战争爆发前,利比亚国内尚未建立起一整套规范的治理体系和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政府,传统的部落权威超越了政府权威。2003 年,伊拉克部落问题专家法利赫·贾巴尔(Faleh A. Jabar)和胡沙姆·达伍德(Hosham Dawod)在其合著的《部落与权力:中东地区的民族特性与族群特征》一书中,运用人口统计学方法对伊拉克人、库尔德人、摩洛哥人以及不同国家的阿拉伯人、伊朗人作了案例研究,考察了部落与国家的关系。他们认为利比亚人口的同质性较高,缺乏显著的多样性,部落间总体上呈平行关系。<sup>①</sup>

2011 年利比亚战争后,利比亚国家政治过渡和国家重建因部落冲突频发而严重受挫,部落制度与国家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国内外学者开始深入研究部落制度在利比亚国家形成与构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对国家政治结构的影响程度。学界多认为,在利比亚,部落认同已成为国家的一种基本认同;部落制度的延续可能会衍生出多种新的形式;部落虽然是一种非正式组织,但其在国家政治、经济等领域中的作用不断增强。<sup>②</sup>

## (二) 利比亚部落制度先于国家制度产生并持续至今

利比亚是以部落为社会基础的国家,部落先于国家存在,深深扎根于国家的社会、军事、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利比亚领土上最早的居民是以部落为单位进行生产活动的。公元前 10 世纪至公元 11 世纪期间,利比亚大部分领土先后受到不同外族的入侵,或处于外族的统治之下,因抵御外来入侵者的需要,部落联盟应运而生。至 20 世纪初,利比亚的不同地区分别处于不同的异族统治之下。无论是异族争夺,还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其实质是实行摄政制度。当时的利比亚处于多部落并存状态,民众接受所属部落的直接统治和管理。利比亚在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之前,尚未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和完善的政府组织,仍处于部落散居状态。<sup>③</sup>

20 世纪上半叶,利比亚长期处于意大利的殖民统治下,部落制度成为殖民统治者征服和统治的工具:一方面,殖民者通过贿赂、拉拢大部落首领等方式,实现对整个国家的殖民征服;另一方面,殖民者利用或挑唆部落间的矛盾以实现部落相互牵制和互相削弱的目的。利比亚的政治架构便形成于这一时期,并持续至国家独立后。由于国家制度的先天不足和殖民者的统治策略,国家难以实现对部落的绝对掌

<sup>①</sup> Faleh Abdul-Jabar and Hosham Dawod, eds., *Tribes and Power: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Saqi, 2003.

<sup>②</sup> Mohamed Hussein, "Libya Crisis: What Role Do Tribal Loyalties Play?," February 21, 2011, <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12528996>, 登录时间: 2015 年 12 月 1 日。

<sup>③</sup> 参见[美]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利比亚史》韩志斌译,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11 年版,第 1-48 页。

控。在殖民时代,部落深深植根于利比亚社会,作为非官方组织,部落自身的政治功能并不显著。

异族统治和殖民统治打乱了利比亚民族和国家正常的历史演进步伐,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和自身利益,刻意保留并对当地的部落制度并加以利用,导致利比亚独立后整个社会的基础并非基于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和情感认同的统一民族,而是根深蒂固的部落认同和部落忠诚。

### (三) 利比亚独立后的统治方式强化了部落认同

1951年12月,利比亚在内外因素的共同驱动下,以及多种力量的复杂博弈下实现独立。在利比亚国家建构过程中,现代化进程缓慢,甚至一度出现倒退,这给部落认同提供了生存空间。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统治时期,部落认同仍是维系整个社会强有力的纽带。伊德里斯国王曾试图构建一种基于全民平等的意识形态,以加快政治、经济发展,削弱传统社会的基础。为维护统治,伊德里斯国王不得不依赖其所在东部地区的大部落,但对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发展情况关注不足,导致民众归属感仍以部落认同和地区认同为主。

卡扎菲自1969年上台,至2011年政权垮台,其执政初期曾推行去部落化政策,但在执政后期,为维护政权,他推行拉拢部落长老的政策,使部落认同得到强化。卡扎菲执政早期深受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反对包括部落制度在内的利比亚旧有政治结构,试图构建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忠诚取代旧有部落认同。20世纪80年代后期,面对内忧外患,卡扎菲为维持威权统治,利用部落因素成为其控制国家的策略之一。虽然利比亚95%以上的国民属同一民族、信仰同一教派、说同一种语言,但卡扎菲难以找到在民众之间制造矛盾的突破口,因此回归部落统治,重用本部落亲信,在其他部落间制造矛盾和分歧,打压和边缘化不支持政权的部落,成为卡扎菲分而治之策略的重要手段。通过频繁调整统治机构,强化部落认同,卡扎菲将部落主义融入政治机构的运转中。2011年,利比亚战争的爆发及战后形势深受部落因素的影响:利比亚东部地区成为动荡的策源地,该地区的部落长期受到卡扎菲政权的打压;大部落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参战双方力量的对比;战后,原支持卡扎菲的部落权力丧失殆尽,甚至被追剿或驱逐出原居住地。简言之,在利比亚的历史进程中,部落因素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 二、战后利比亚乱局的基本情况

战后利比亚政局长期动荡,陷入权力真空的局面;国内各派别间的武装冲突不

断,极端恐怖组织乘机大肆扩张。自 2014 年 9 月以来,联合国利比亚援助特派团对冲突各方展开斡旋,各方进行多轮对话后虽已签署组建联合政府的协议,但未来政治和解进程的实质性推进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利比亚乱局难以在短时间内结束,国内动荡长期化趋势凸显。

利比亚战争后,国家权威缺失导致利比亚国内局势陷入失控状态,各种部落势力斗争加剧。由于自然、历史等多方面原因,利比亚缺乏强大的国家凝聚力,地区和族群差异显著,部落博弈激烈。卡扎菲在其统治期间经过多年经营,将国家权力牢牢掌握在本部族手中,抵制政党制度,长期通过高压政策和独裁手段统治利比亚。利比亚战争爆发后,威权政府伴随强人政权的倒台而解散,国家如同一盘散沙,缺乏可以服众的威权人物或政府领导国家政治转型、过渡和经济重建。国家权威丧失进一步引发部落武装割据状态,具体表现为:

第一,三大地区各行其是。利比亚战后初期,政治过渡进程开启,东部和南部地区因不满权力分配要求独立或自治,其结果是,东部地区实现自治,自治政府拥有除外交权以外的一切自治权力;南部地区不服从中央政府的管控,几近成为“飞地”。的黎波里作为国家的法定首都已名存实亡,整个西部地区沦为动荡的重灾区。

第二,民兵武装割据。利比亚战后,民兵武装组织迅速兴起并坐大,呈现割据状态,为争权夺利展开厮杀混战。战后五年间,民兵组织呈现军阀化趋势,部分民兵组织或同极端恐怖势力联合,或充当地区大国在利比亚博弈的“代理人”,直接导致利战后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和政治过渡进程举步维艰。

第三,部落冲突频发。利比亚战后,国家权威瓦解,部落间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导致各部落势力为争夺地方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当前,在利比亚西部和东部地区,部落冲突多与民兵武装混战相结合,南部地区部落冲突的频度和烈度持续上升。利比亚当前的部落冲突主要在前政权的支持部落与反对部落间、阿拉伯部落与柏柏尔部落间,以及存在利益争端的相邻部落间展开。<sup>①</sup>

外部势力的严重干涉加速了利比亚威权政府的倒台,战后西方国家态度的转变更加凸显了其恶化利比亚政策的功利性。利比亚战争期间及战后,外部势力对局势具有重要影响,外部势力干涉对当前利比亚乱局的形成和持续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11 年,西方国家打着“保护的责任”的旗号,推行新干涉主义,利用军事打击推翻卡扎菲政权。如果没有西方大国的干涉,以当时利比亚反对派的实力难以在数月内实现政权更迭。利比亚战争期间,在是否借助外力的问题上,反对派内部曾

<sup>①</sup> 王金岩《从独裁统治到权威碎裂:利比亚战争爆发四周年》,载《当代世界》2015 年第 4 期,第 55-58 页。

存在严重分歧:一方面,反对派中的本土派认为利比亚国内危机系兄弟阋墙,应自行解决,不应寻求西方支持而造成“引狼入室”;另一方面,反对派中的海归派认为应借内战契机一举推翻卡扎菲的统治,为此不惜借助一切内部和外部力量。最终,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方大国军事干涉利比亚内乱,加速了卡扎菲政权的倒台。

然而,战后的利比亚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反而陷入内战长期化、国家失序、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的境地,由此造成严重的安全、社会和民生危机。在此情况下,利比亚国内对西方介入的态度上出现更加明显的分歧:以过渡政府官员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利比亚应依赖西方国家的帮助恢复国内稳定,并与西方相关企业开展合作以发展经济;以民兵组织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西方国家在利比亚谋求自身利益,置利比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导致利比亚战后陷入持续动荡。为反对西方势力介入利比亚乱局,民兵武装组织将西方国家驻利比亚使领馆、企业及各界人士作为袭击目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遇袭事件。此后,迫于利比亚不断升级的安全危机,西方国家逐步撤出其企业和人员,对利比亚过渡政府多次发出的求助呼声充耳不闻,选择性地抛弃利过渡政府。至此,西方国家介入利比亚内战的目的不言自明。

当前,利比亚乱局的外溢效应持续发酵,已危及到西方国家的安全。一方面,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利比亚国内持续动荡的地区扩张势力,并谋划和实施针对利政府和西方国家的袭击。另一方面,利比亚乱局导致利边境线管理失控,大量来自北非国家的难民取道利比亚海域进入欧洲,加重了欧洲国家的社会危机。欧盟数据显示,“阿拉伯之春”爆发五年来,每年有数万至数十万利比亚难民乘船驶向意大利。据联合国统计,2015年1~10月,近13万人从利比亚出发偷渡到意大利。<sup>①</sup>在此形势下,美、英、法等国再次在利比亚境内部署军力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西方国家利比亚政策的功利性再次显现。

战后利比亚政治安全局势持续恶化,经济重建推进艰难,极端恐怖势力的肆虐进一步加剧了利国内局势的动荡。

第一,政治局势持续动荡。2012年7月,利比亚举行了战后首次全国大选,产生了由200名议员组成的国民议会接管国家权力。从表面上看,利比亚在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迅速建立起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但是,此后临时政府的组阁和执政却波

<sup>①</sup> “Libya: UN Development Programme Launches Initiative to Support Country’s Stabilization”, April 12, 2016,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53670#.VxmEKPmVodU>, 登录时间: 2016年4月20日。

折不断。截至 2014 年初,利比亚过渡政权已历经 5 位总理。<sup>①</sup> 2014 年 2 月 7 日,国民议会以未完成任务为由,在宗教势力的主导下自行将任期延长至年底,此举在利国内遭遇激烈反对。3 月中旬,国民议会迫于政治压力决定设立国民代表大会以移交权力,但迟迟未确定具体的选举日期。5 月 18 日,利比亚退役将领、世俗派代表人物哈夫塔尔命令津坦(Zintan)民兵武装攻打国民议会。当晚,与哈夫塔尔关系密切的军方将领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但国民议会并未就此真正解散。6 月 25 日,利比亚举行了第二次全国大选,产生了国民代表大会。<sup>②</sup> 然而,国民议会并未履行移交权力的承诺,而是将国民代表大会逐出首都的黎波里,迫使其落户东部小城图卜鲁格。自 8 月起,利比亚陷入两个议会、两个政府并立对峙的局面。9 月,在联合国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的斡旋下,利比亚冲突各方间开展多轮对话,终于在 2015 年 12 月 17 日在摩洛哥海滨城市斯希拉特签署《利比亚政治协议》,同意结束分裂局面,共同组建民族团结政府。<sup>③</sup> 至此,利比亚重启政治过渡进程。从当前局势看,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能否顺利执政,仍面临多方面挑战。正如联合国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联合国利比亚援助特派团负责人马丁·科布勒所言“我们不能忘记,这(签署《利比亚政治协议》)只是(利比亚政治过渡)艰难行程的开端。”<sup>④</sup>

第二,经济重建推进艰难。2011 年利比亚战争爆发前,利比亚是一个典型的“食利型”国家,国家的日常运作和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石油出口收入。战争期间,包括石油港口、输油管道等在内的国家基础设施遭严重损毁。战后,历届过渡政府都以恢复和发展油气产业为首要任务,并着手国家多个领域的战后重建。然而,由于战后政局持续动荡和各派别间的冲突升级,油田、输送管道、港口等重要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利比亚的经济重建不仅未能有效推进,反而呈现倒退之势,石油出口量从战后伊始的每日 130 万桶直降至每日 30 万桶。国家经济几近崩溃,民生潦倒,经济重建严重受挫。

第三,安全局势急剧恶化。战后利比亚安全局势急剧恶化,突出表现为世俗力量与宗教势力间为争夺国家领导权展开激烈博弈;割据一方的民兵组织间龃龉不断;各部落间冲突频发;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恐怖势力趁乱坐大,各极端组织间实现联动,严重威胁利国内安全。当前,利比亚已成为恐怖势力的巢穴,

① 王金岩《利比亚战后政治重建诸问题探究》,载《西亚非洲》2014 年第 3 期,第 139 页。

② 陈向阳、张远《欧盟特使敦促利比亚各方通过谈判解决危机》,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26/c\_1110852418.htm,登录时间:2015 年 5 月 26 日。

③ 于杰飞《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总理返回首都》,载《光明日报》2016 年 4 月 1 日,第 12 版。

④ 张远等《综述:利比亚政治过渡重新开篇》,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5-12/18/c\_1117503109.htm,登录时间:2015 年 12 月 18 日。

以及危及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安全的一个毒瘤。

### 三、部落因素对战后利比亚乱局的影响

部落因素对战后利比亚的政治过渡、经济重建、安全局势和对外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 (一) 阻碍政治过渡

战后利比亚首先面临政治过渡的艰巨任务,政治过渡是利比亚国家重建进程的重要前提。总体上看,利比亚的政治过渡进程充满曲折,濒临失败。利比亚战争爆发五年来,国家仍未实现预期的民主政治,反而陷入更加严重的政治碎片化,突出表现为战后选举产生的议会执政乏力,两大议会并存角力,总理更换频繁,组阁举步维艰,两个政府并立对峙等。部落因素严重阻碍了利比亚的政治过渡进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 1. 部落因素阻碍民主政治的实现

卡扎菲政权时期,利比亚采取的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民众国体制,卡扎菲将其政权称为人民政权,却又采取事实上的部落统治,将国家大权揽于其所属和支持的部落囊中,强化了官方政治中的部落观念。2011年利比亚战争结束后,国家朝着民主目标开启政治过渡进程,但在转型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根植于利比亚社会的部落制度构成了政治过渡和民主化建设的重要阻碍因素。

第一,部落观念干扰民主化建设。部落观念中的对内团结、对外排他、自成一体的,以及唯部落首领马首是瞻的多种特性令多数裁定原则<sup>①</sup>难以有效实施,严重干扰了民主化的推进。利比亚社会的部落观念令民主原则出现反民主的变异趋势。在利比亚,部落首领的意志代表了全体部落成员的共同意志,由于各部落人口数量存在较大差异,一人一票制产生的结果并不是真正公正的相对多数,而是“成问题的多数”。在选举中,民众在投票表决时不是根据候选人的意识形态或具体的政治纲领,而是依据其部落属性,只把选票投给代表本部落利益的候选人,或者是部落首领指

---

<sup>①</sup> 多数裁定原则是实现民主化的重要手段,也是民主政治特别是民主决策惯用的手段,构成民主政体合法性的基础。但是多数裁定原则的施行必须建立在社会团结平等的基础上,即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当多数与少数构成一个整体时,多数裁定原则才能真正得以实施,且“多数”的质量和内涵也存在差别。根据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作为民主要素和标准定义的多数裁定原则至少可划分为三个量级:一是合格多数,一般定在2/3以上;二是简单多数,即绝对多数,定在1/2以上;三是相对多数,即不过半数的多数。参见[美]阿伦·利法特:《多数裁定原则的理论和实践:不完善范例的顽强性》,吴展译,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2年第3期,第15页。



定的人选。如此,在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则下,选票被打上了浓重的部落制度烙印。<sup>①</sup>其结果是,只有来自大部落或是大部落支持的候选人才可能在选举中获胜,进而在政府中处于支配地位;那些出自小部落的候选人,除非在选举中结成联盟,否则注定被排斥在国家权力的核心之外,即使勉强挤入,也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可见,利比亚的部落观念难以顺应民主的要求和原则。

第二,部落制度干扰民主化进程。一方面,利比亚民众将本部落的首领视作唯一的效忠对象,对国家统治者的指令不予重视,这构成了利比亚实现民主化的制度性障碍。另一方面,在部落制度下,部落首领的治理方式是按照部落主义的逻辑行事,以获得和维持自身权力为目的,为此不惜煽动部落仇恨,而非为治国安邦计,导致难以制定出合理的政治纲领、发展计划等有具有现实意义的良策。利比亚战后各方势力在权力争夺过程中,为达到当选目的,运用部落主义不择手段地争取大部落首领的支持严重干扰了利比亚战后的民主化进程。

## 2. 部落因素对战后利比亚政权平稳过渡构成挑战

战后利比亚首先面临的任務是国家体制的重新选择和政权过渡,只有建立起稳定、有力的政权才能顺利、高效地推进国家重建,进而为国家的发展创造制度基础、文化基础、民族基础和心理基础。然而,部落因素对维持利比亚统一的国家形式及其政权平稳过渡均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部落的分裂性、离散性与国家形式要求的统一性与集权性之间的矛盾。

部落制度与统一的国家形式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一方面,部落因素是利比亚要求实行统一国家形式的原因。从国家发展的需求看,统一的国家形式是战后利比亚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团结的客观需要和最佳选择。在政治上,现代化进程能够促使狭隘的部落忠诚转变为广泛的国家认同和民族忠诚,后者是民族国家建构和重建的必备条件;在经济上,统一的国家形式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调配资源,开展经济重建。从部落特征看,利比亚的部落文化具有团结性、排他性、继承性等特征,部落间的矛盾、冲突也大多源于此。然而,从国家整体看,民众又将利比亚作为一个大的部落联盟,团结一致,抵御外敌。部落文化的继承性特征也使得绝大多数民众不愿改变现有的国家形式。利比亚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国家认同。因此,部落文化的特征决定了国家统一是多数利比亚民众的选择,只有采取统一的国家形式才可克服部落的分散性。

另一方面,部落意识也阻碍着国家统一。部落的排他性特征决定了部落间的竞争性甚至是对抗性的关系状态,部落冲突的历史早已印证了这一点。利比亚的统一

<sup>①</sup> 张宏明《部族主义因素对黑非洲国家政体模式取向的影响》,载《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第37页。

是通过强制手段取缔、兼并反对部落的直接结果,但这种结果并不能增强国家统一意识和淡化部落意识。因此,反对派势力在政权的强势打压下,并未得到彻底清除,一旦条件具备,反对派势力必然揭竿而起,对利比亚的统一国家形式构成挑战。从战后利比亚的现实来看,部落冲突造成利比亚难以构建起维系和动员全体国民的国家整体利益观念,难于共同制定和持续追求国家的长期战略与发展目标,这在战后利比亚艰难的组阁进程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战后利比亚一年内选举产生出国民议会,此后的政府总理人选的确定和组阁却遭遇挫折。利比亚战争后至2014年7月的三年多时间里,该国先后产生了五位政府总理,其中任期最长的一位任职一年半,其余多任职不久月就迫于压力下台,有的甚至两度组阁失败而直接去职。利国民议会议长一职也多次更换人选。多次组阁失败皆因政府未能协调好各部落间的关系,一些部落不接受权力分配的结果。2014年8月至今,国家权威进一步碎裂,陷入两个议会、两个政府并存对峙的局面,双方都有各自的支持部落,相互间为私利争权,国家遂陷入分裂。

## (二) 破坏经济重建

战后利比亚的经济重建和发展是其他领域重建的物质基础。利比亚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石油储量位居非洲国家首位,天然气储量也位居非洲前列,但独立后的利比亚未能实现经济的多样化发展,而是陷入食利型经济,造成国家的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能源出口收入。战后利比亚的几届政府虽有开展经济重建的意愿,但因深陷政治纷争,难以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放在国家重建的首要位置,而是空谈政治,造成战后冲突频发,阻碍经济重建。其中,部落因素是制约利比亚经济统筹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 1. 利比亚能源产业的复苏与发展受制于部落间的利益分配

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利比亚能源的大量发现和开采使其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经济快速增长,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大幅改善。能源产业是利比亚的经济命脉,因此战后几届政府仍然以恢复和发展能源出口作为其经济重建首要任务,经济的全面重建为其他领域的重建提供了物质基础,但部落间矛盾冲突却成为阻碍经济重建的重要因素。

部落对利比亚社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能源领域具体表现为一些大型油田、输油管道等能源基础设施分布于多个部落控制区域,部落间的协调与配合决定着能源出口是否畅通。然而,战后利比亚各部落立场不一,对中央政府的服从度也不同,导致政府难以有效调配资源实现统筹发展。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部落将对能源的控制权作为争夺势力范围的筹码,严重影响能源产业的整体性恢复和发

展。当一些部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或利益分配出现问题时,便公然违抗中央政府的指令,不允许国家石油公司进入部落控制区域作业,乃至关闭本部落区域内的油田,以此威胁政府和表达不满。此外,部落冲突也直接影响着能源产业的复苏。跨部落分布的油田的生产工作也常受到部落间关系的影响,当两部落间关系出现不睦时,各自将对该油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作为武器,相互间不能配合,甚至恶意破坏油田设施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政府对油田无法充分开发和利用。

利比亚战后半年内,石油出口逐步恢复至每天约 140 万桶的生产能力,接近战前水平。2012 年全年,利比亚石油收入近 600 亿美元,与国家财政预算基本持平。<sup>①</sup>但此后愈演愈烈的部落冲突致使能源产量大幅缩水,自 2013 年下半年以来,利比亚石油产量屡次跌破历史最低点,导致利比亚经济几近崩溃,部落冲突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因素之一。

## 2. 部落冲突导致利比亚其他经济领域的重建工作迟滞

利比亚战争结束后,能源产业外的其他经济领域的重建同步启动,但同样因受到国内冲突环境的制约一再推迟甚至停滞。利比亚临时政府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经贸合作置于重点发展的位置。在国内,临时政府已大规模启动与外国企业的洽谈,内容涉及妥善解决因战争造成损失的定损和赔偿问题,也涉及大量新项目的启动。为促进经济重建,部分利比亚驻外使馆的商务官员积极与当地公司取得联系,试图将利比亚国内需求与当地公司的能力实现对接,寻找合作的契合点。但是这些领域的建设却因利比亚国内安全环境恶化而难以顺利开展,部落冲突在其中的消极影响逐渐凸显。

政府因难以协调部落间的关系导致其执政能力备受利比亚民众质疑。官员权责不明、政府的调控能力有限、经济建设缺乏指导进一步导致经济重建进程频频受阻。部落冲突导致能源产业陷入停滞乃至倒退,能源收入的急剧下降造成其他经济领域的重建工作因资金匮乏而被迫中止。部落冲突还导致安全局势急剧恶化,生产、生活资料匮乏,外国企业纷纷关闭驻在机构,甚至全面撤侨,进而使利比亚经济重建陷入困局。

当前,利比亚经济重建中最紧迫的任务是加强宏观调控,协调各方力量,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开发能源,但在当前国内冲突频发的现实下,利比亚经济重建面临重重障碍,其中部落冲突严重制约和破坏利比亚的经济重建进程。

### (三) 加剧安全危机

社会稳定是国家重建的安全保障。战后利比亚陷入日益加剧的安全危局,突出

<sup>①</sup> 才扬《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公布最新石油产量数据》,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9/04/c\\_123667306.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9/04/c_123667306.htm), 登录时间: 2012 年 9 月 4 日。

表现为地方势力割据及其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其实质是地方武装组织拥兵自重和国家军力的整体性衰弱。利比亚战后至今仍未建立起强大而统一的国家军队,导致政府难以收编地方武装组织和收缴散落民间的武器。在这方面,部落因素既是利比亚安全危机重要的催化因素,又是政府解决安全问题的难点所在。

首先,部落冲突是安全危机升级的重要成因。在卡扎菲统治时期,虽然各部落之间存在重重矛盾,但尚能保持相对平衡和基本稳固的利益架构。战后利比亚国家权威瓦解,部落间原有的平衡被打破,部落矛盾与社会经济矛盾相互交织,导致部落间冲突不断。按照地区划分,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部落冲突多与民兵武装冲突相交织,南部地区的部落冲突的频度和烈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在冲突主体上,当前利比亚的部落冲突主要存在于前政权的支持部落与反对部落间、阿拉伯部落与柏柏尔部落间,以及存在利益冲突的相邻部落间。在冲突类型上,利比亚的部落冲突既有部落间的权益之争,也有部落对国家政权的武力挑衅,部落成员间的矛盾有时上升为部落间冲突,部落冲突与武装冲突相互交织,威胁地区安全局势,乃至抢夺、破坏国家公共设施的程度。2014年1月,利比亚南部塞卜哈镇支持前政权的卡达法部落和支持现政权的苏莱曼部落之间爆发激烈冲突,造成30多人死亡。在多方调停下,两部落间的大规模冲突暂时中止,但部落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摩擦时有发生。同年9月,双方再次爆发激烈交火,造成逾百人伤亡,之后经部落长老的多次调停才达成停火协议。<sup>①</sup>由此可见,部落冲突已成为利比亚安全危机升级的重要成因。

其次,部落因素是国家军队建设的掣肘因素。利比亚战后安全危机的形成与升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国家军队重建滞后,无力应对战后乱局。卡扎菲统治时期对正规军缺乏信任,大量扶植和依赖本部落及联盟部落的武装民兵和雇佣军,造成国家军队作战能力低下。利比亚战争导致国家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瓦解状态,面对日趋严重的安全危机,构建强大的国家军队,解除部落、民兵武装、收缴武器成为当务之急。

卡扎菲统治时期,除支持政权的部落外,其他部落一律被禁止拥有武装力量。利比亚战争期间和战后,大量武器流散,各部落纷纷建立起本部落武装,介入战后乱局,争夺势力范围。由于部落认同使然,部落成员只听从本部落长老的指令,对于国家收缴武器、解除部落武装、构建统一军队的呼吁不予配合,而是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或各自为战,或结成联盟,导致政府解除地方武装、收缴武器的工作更加困难。总之,部落的独立性与国家军队的统一性成为一对矛盾体,凸显了部落制度对国家军

<sup>①</sup> 《利比亚地方部落为争地盘爆发冲突政府派兵镇压》,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02-19/3679708.shtml>, 登录时间:2012年2月19日。

队建设的破坏作用。

最后,部分部落为极端恐怖势力提供庇护。利比亚战争期间及战后,极端恐怖势力趁乱渗透和扩散。利比亚部分部落之所以为极端恐怖势力提供庇护,与部落文化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第一,崇尚自由、放荡不羁的部落性格,使部落成员难以接受国家的统一管束,尤其是生活在相对条件艰苦、文化落后的偏远地区的部落成员,易于受到其他组织的收买和蛊惑,极端恐怖组织往往利用这种特征渗透进当地部落。第二,部落的尚武精神和扩张意识与恐怖分子的主张“不谋而合”,导致部落与极端恐怖组织存在扩张势力范围的目标。第三,部落的血亲复仇意识和继承制度,导致部落间以暴制暴现象长期存在,根植于部落文化的暴力意识反过来又为恐怖极端势力所利用。<sup>①</sup>第四,部落对内团结、对外排他性的特征符合恐怖组织的作战策略,当本部落与其他部落发生冲突时,不分对错,仅以内外区分,“外人”即是“敌人”,同时,对本部落的所有成员给予无条件保护。基于上述特征,一些部落对属于本部落的极端分子提供无条件的庇护,拒绝政府军或反恐部队进入部落属地,甚至武装袭击搜捕部队,引发同政府军更大规模的武装对抗。

#### (四) 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

部落因素对外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利比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利比亚战争期间,利比亚反对派曾在是否借助外力推翻卡扎菲政权的问题上存在争议。战后利比亚陷入派系之争,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趋于复杂。

战后伊始,西方国家多获得了利比亚国家重建的多数重大项目。然而,随着利比亚战后安全形势急剧恶化,部分武装分子将利比亚战后乱局归咎于西方国家的武力干涉,认为这些国家参与利比亚重建的目的是为攫取利比亚的各种资源。武装分子频频对一些国家在利比亚的驻在机构、企业和个人发动袭击,既出于报复西方国家的干涉,也为抹黑令他们不满的政府。在此背景下,武装分子的态度和举动正是源于其根深蒂固的部落意识。战后利比亚国内局势的恶化导致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撤离驻在利比亚的机构和个人。西方国家撤离后,利比亚战后重建几乎陷于停滞状态。

2014年8月,利比亚陷入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此后,国家安全局势恶化,各种势力纷纷介入搅局。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极端恐怖势力在利比亚境内趁乱肆虐,实现对德尔纳、苏尔特、萨卜拉塔等多地的实际控制,将利比亚作为“伊斯兰

<sup>①</sup> 参见 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General for Refugees and Stateless Person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sation Service, Ministry of Security and Justice, *Report Libya: Militias, Tribes and Islamists*, December 19, 2014, [http://www.landinfo.no/asset/3025/1/3025\\_1.pdf](http://www.landinfo.no/asset/3025/1/3025_1.pdf), 登录时间:2016年1月18日。

国”组织重要的海外恐怖分子训练基地,并试图通过控制利比亚的石油资源增加资金收入。此外,大量非洲国家的难民取道利比亚,偷渡至地中海另一侧的欧洲国家,加重了欧洲国家的社会危机。当前,利比亚的军事能力仍不足以独立应对上述问题,因此,是否求助于西方大国的问题再次出现。部落意识导致各方在此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且西方大国对利比亚的“帮助”必定会受到部分部落的强烈反抗而难以顺利推行。对西方大国而言,战后利比亚安全形势恶化,针对西方的袭击世界频发,导致其对利比亚采取了避而远之的态度,但极端恐怖势力在利比亚的蔓延又使得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盟国家出于本土安全的考量,不能对利比亚乱局坐视不管。至今西方国家对参与利比亚反恐的态度仍不明朗,而根植于利比亚社会的部落意识进一步使得该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趋于复杂化。

#### 四、结语

当前,利比亚的两个对峙政府虽已签署了《利比亚政治协议》,同意成立一个新的民族团结政府,结束两个对立政府的分治局面,但在此后组建联合政府具体措施的实施上仍存在严重分歧。利比亚实现全面和平与发展依然前途未卜。在此过程中,部落既可以发挥调解矛盾、劝和促谈的功能,也可以发挥阻碍利比亚政治经济重建的破坏作用。无论是平息利比亚南部的混战乱局,还是促使东、西部两个政府达成和解,国际社会在利比亚反恐问题上都离不开对当地部落因素的考量。利比亚战后至今尚未建立起权威政府,尚未产生有能力促成各派和解以结束战乱的组织或领导人,而多数利比亚派别和民众因部落意识使然不愿意接受外部势力介入,导致当前利比亚的调停和促和重任大多由部落酋长担当。在反恐问题上,部落文化导致部落成为恐怖势力在利比亚藏匿的“避风港”和作乱的“安全通道”,只有部落酋长带领其治下部落成员积极配合协助,才能使反恐斗争产生实效。总之,在战后利比亚的政治重建、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问题上,部落仍是不容小觑的关键性因素。

(责任编辑:赵军)